

西遊記及明清小說研究

苏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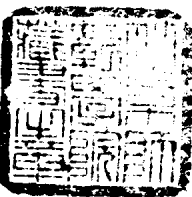
苏 兴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5359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85359

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

苏 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 7.5 字数16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5-0410-7

I·221 定价: 2.90元

目 次

关于《西游记》的写作时间及吴承恩经历中若干问题……	(1)
有关吴承恩考辨三题……	(16)
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26)
《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	(45)
《西游记》的地方色彩……	(65)
《西游记》的女儿国……	(72)
《西游记》琐谈……	(84)
《西游记》第九回问题……	(105)
试论《后西游记》……	(117)
《京本通俗小说》辨疑……	(142)
《京本通俗小说》外志……	(150)
再谈《京本通俗小说》的问题……	(161)
《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	(175)
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说……	(199)
张匀、张劭非同一人……	(230)
后 记……	(237)

关于《西游记》的写作时间及吴承恩 经历中若干问题

一、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时间的考证

《西游记》的写作时间过去有两种推测：

一、年轻时作。清阮葵生《茶馀客话》说：“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狴，游戏三昧，亦未可知。”①

二、老年家居时作，这是一般的看法。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于是一百回的《西游记》，便在他的晚年写成了。”②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师生合编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明确说明吴承恩七十一岁时才开始写《西游记》③。

我初步认为吴承恩中年即三四十岁时就在写《西游记》，或者就已经完成了。

朱曰藩《山带阁集》第九卷《赠吴汝忠》：

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暮云。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漫比终军。

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即新版《吴承恩诗文集》，下简称《存稿》）卷一有一首题《赠子价》：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

这两首诗很显然是互相赠答之作，朱曰藩先有作，吴承恩是回赠。《山带阁集》前二十五卷的诗歌部分都是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按迹寻踪，可以确定《赠吴汝忠》一诗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冬或二十一年(1542)春^④。朱曰藩的赠诗说从吴承恩那里欣赏到了奇文，但是自己有意见，认为吴承恩应“珍重大才行瑞世”(意思是应专心科举功名)，不应像“少年人”那样“谩比终军”(意思是不应效请缨域外式的注意殊方奇谈)。吴承恩回赠的诗表示不同意朱曰藩的指责，他夸赞朱曰藩的前六句诗是有点讽刺意味的^⑤。第七句诗说我叫你看的是咏海外的三山赋，而你却赠我一件五色袍(五色袍是当官后才能穿的官服，明代老百姓包括儒士生员，按制只能穿素色的衣服)。

吴承恩作的涉及殊方异域的奇文是什么？当然不会是一首诗或一篇散文，更不会真是咏海外三山的赋，看起来也不会是吴承恩另一著作的《禹鼎志》(按照唐代传奇样式写的《禹鼎志》在明代并不为学士文人所鄙薄，以至被朱曰藩指责为浪费大才)，我认为这奇文就是《西游记》。因为《西游记》写的正是朱曰藩指责的和吴承恩自诩的海外或域外生活。这就是说，嘉靖二十年(1541)冬或二十一年(1542)春，吴承恩已写成了《西游记》或完成了初稿，至少是正在写作。

上边是我认为《西游记》是吴承恩中年所作的主要依据。由这样的考虑出发，我又想到两点旁证。

(一)《西游记》所写到的世俗生活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曾五次写到或提到年景荒旱^⑥，而没有写到过水灾。我们由此有理由想像作者印象最深的是旱灾而不是水灾。吴承恩长期生活的淮安实际情况如何呢？据统计，我国历史上自公元初到十

九世纪,长江流域水旱灾都比较频繁^⑦。淮水流域当然就更是如此了。那么吴承恩生活年代里,淮安附近水旱灾的具体情况就能侧面的给《西游记》写作时间提供一些线索的吧。据《明史》武宗纪、世宗纪、穆宗纪、神宗纪、五行志、河渠志以及另外一些资料统计知道淮安地方在吴承恩少年到壮年时期主要闹旱灾,老年时期主要闹水灾。关于这,吴承恩的好友沈坤和同乡胡效谟(胡珪之子,也应是吴承恩的朋友)曾有文记载。沈坤《漕抚王公遗爱碑》^⑧说:

嘉靖壬寅(按:二十一年)句曲克斋王公,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命总督漕运,兼巡抚江西四郡三州之地,即淮开督府。淮当畿辅襟咽,名水陆冲要……属频岁赤旱,心切然以为深忧,奔走群望祷焉,祷辄雨,仍遍檄郡邑,令无重民灾,……故虽亢阳流虐,而年亦不至大浸。……今年丙午(按:嘉靖二十五年),皇帝嘉公之绩,征入为户部尚书。……

这说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淮安是频年亢旱的。连同其他材料可证吴承恩三四十岁时的嘉靖十四年(1535)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大约十一年的旱灾周期是很明显的。胡效谟的《淮安大水记》^⑨则说:

淮安自嘉靖庚戌(按:二十九年)以来,比年大水,至隆庆己巳(按:三年)岁为最大。……明年庚午(按:四年)五月河淮水又大发,……。

这,连同其他材料,又可知吴承恩生活最后的三十多年,他的家乡淮安连年有水灾,而晚年尤重。

根据前述论列的淮安水旱灾的具体情况,是否可以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三四十岁壮年家乡多旱灾时,即与前述论断相吻合的那个时期写成的,而不是晚年淮安多水灾时写成的呢?

(二)过去时代的小说家或戏曲家往往把自己的思想、行

为通过自己作品的正面人物表达出来，甚而就按照自己的身世塑造正面人物。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之写杜少卿，曹雪芹在《红楼梦》之写贾宝玉。看起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作者理想所寄托的正面人物。孙悟空的反抗权威，爱自由，不怕困难，自傲，讽刺人不留余地，……等等就是作者自己的性格的表现，这样性格的孙悟空，如说是作者壮年时期的创造比之认为是老年时期的创造更合适些。当然，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能有壮年人的豪迈心肠，写不出具有壮年人思想、行为的人物，不过按之吴承恩年老时的心情是难于写孙悟空的。有年代可查的吴承恩在隆庆后作的诗篇如《寿邵元哲诗》、《邵郡公邀同郭山人饮招隐庵》、《瑞龙歌》等，从内容看和写孙悟空的吴承恩应有一定距离，而《赠子价》、《杂言赠冯南淮比部谪茂名》肯定是壮年时的诗篇恰与之相反。像《二郎搜山图歌》也有证据说明是他壮年时的诗作。

二、吴承恩考取岁贡生年代的订正

吴承恩被认为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选取的岁贡生，多少年来没有人疑惑过，实际是错误的。

翻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在第十七篇看到这样的记叙：

吴承恩，……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见……光緒《淮安府志》贡举表）

按：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二贡举表三页下，明代山阳县贡生表前有修志人的一段说明：“优、拔贡注明科分，副贡次入举人内，恩贡注在本名下，不注者皆岁贡。又，旧志岁贡无年分，止

依时代分题府县学。乾隆后有年分可考，已见各县志，此不复详。”我们细按贡举表，可以看出确实是按这说明把岁贡止依时代分题府县学而加以排列的。第一栏的纪年是标明进士或举人的年分，在每一个皇帝的元年第一行就平列贡生的名字，因此，第一栏的纪年并不说明贡生栏的某人与之对齐，某人便是该年的贡生。这误会第一个不是来自鲁迅。董作宾1923年2月5日写的《读〈西游记考证〉》便根据光绪《淮安府志》把吴承恩中岁贡放到嘉靖甲辰下边了，他还说：“周豫才先生看光绪《淮安志》，遗漏了这一条。”明年(1924)3月鲁迅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也误信了董作宾的话，定吴承恩是嘉靖甲辰选取的岁贡。后来人们恐怕是因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写的，便毫不怀疑的继续沿用，对光绪《淮安府志》如果翻检也马虎过去而不能发其覆了，于是一个小小的资料性的错误被沿用了将近四十年。

那么吴承恩是什么时候考取的岁贡生呢？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它的确切年份。不过据嘉靖乙卯(三十四年)正月潘坝写《〈淮郡文献志〉序》时吴承恩似已成岁贡生，序文说：“间与水部倪子伯雨太学吴子汝忠商评校订。”^⑩则嘉靖三十四年前吴承恩已入太学，当太学生了，而明代嘉靖时一般的不是贡生不能当太学生。

三、吴承恩任长兴县丞问题

关于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是在什么时间，前此有两种说法：

一、鲁迅认为是在嘉靖末。这一说法多少年来没有人疑惑过，尤其近年在长兴发现了隆庆元年十月十日归有光撰吴

承恩写的《梦鼎堂记》和《圣井铭》，使人们更有理由认为就在嘉靖末隆庆初是吴承恩任长兴县丞的时间。

二、刘修业给吴承恩作年谱，重新改订为吴承恩丞长兴是嘉靖三十二年，比传统的说法（即嘉靖末）提前了十几年。

我认为嘉靖末说是不容怀疑的，刘修业的新说是缺乏根据的。

第一，李维楨在《射阳先生集选叙》说“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是不含糊的。吴承恩约卒于万历十年（1882），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左右就长兴县丞任，不久去职，则“以老”二字讲得通；如说嘉靖卅二年（1553）任长兴县丞，距卒年还有三十年，那么“以老”的说法不是空话了吗？同样，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说吴承恩“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馀年以寿终。”嘉靖四十五年左右至万历十年的十八九年间是合乎吴国荣所说吴承恩这一阶段行实实际的，如果是嘉靖三十二年至万历十年的三十年间，则吴承恩此段履历可不好写。按刘修业推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是吴承恩补荆府纪善之年，而嘉靖四十二年及以后，有许多证据证明吴承恩是在淮安，那么荆府纪善之补的离任到逝世是二十年，吴国荣“十馀年以寿终”的说法岂不又落了空！刘修业看到了不好解释的难题，只好仅引吴国荣跋语中的前两句，而漏掉了后边的几句。何况潘坝在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写《淮郡文献志》序文时称吴承恩为太学生（见前），陈耀文回忆嘉靖三十八年为淮安推官与吴承恩共编《花草粹编》时称吴承恩为吴生（见刘谱引陈耀文《花草粹编》序文语），可见吴承恩不可能在三十二年任长兴县丞，否则潘、陈二人对吴承恩那样称呼就太不应该了。

第二，刘修业所以定吴承恩是嘉靖三十二年任长兴县丞还有一个理由是：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吴承恩都在京谒选，又是受着李春芳的知遇，这期间曾作《元寿颂》，颂李春芳父亲六十大寿^⑩。说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吴承恩在京谒选的根据不够充分（仅有嘉靖二十九年吴承恩在北京作《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诗，可证嘉靖二十九年确在北京）。而说嘉靖三十一年吴承恩在京师作《元寿颂》，寿李春芳父亲六十寿辰则是错了的。《元寿颂》是颂李春芳父亲七十寿辰，作于嘉靖四十一年，颂文说：“由是自七袞臻期颐”可证（李春芳父亲的六十寿辰是在家乡兴化过的^⑪）。《元寿颂》说：“承恩蒙公殊遇垂二十年，谒选来都，又出公之敦喻。”可见嘉靖四十一年吴承恩还在北京谒选哩，嘉靖三十二年怎么能当上长兴县丞！李春芳父亲的诞辰是“仲冬甲子”，那么吴承恩任长兴县丞顶早也得是嘉靖四十二年。可是嘉靖四十二年吴承恩却回了淮安，这一年他撰有《开府介川毛公德政颂》（《存稿》卷二）；四十三年吴承恩仍在淮安，代淮安知府刘佑撰《留翁遗稿序》（《存稿》卷二）^⑫，又给淮安名人潘坝作神道碑（《存稿》卷二）。——可见吴承恩不可能在嘉靖四十一年或四十二年任长兴县丞。至于刘修业把吴承恩代浙江巡抚都御史刘畿撰《诸史将略序》（《存稿》卷二）定为是嘉靖四十三年也是不对的。序文说：“嘉靖甲子（按：四十三年），恭承上命，总戎务于东南，自惭重任，无以为将士训也，因绌绎往志，授儒生以大意，俾纂而成焉。”嘉靖四十三年任官浙江，假如立即想着手编《诸史将略》，其完成之日当已不是嘉靖四十三的甲子之年了。而以刘畿的口气说“嘉靖甲子”如何如何，则也不是嘉靖甲子当年的口气。所以如定这篇序文是嘉靖四十五年作^⑬，则和传统说

嘉靖四十五年吴承恩在长兴做县丞的时间相合，他是在做为下属代上司捉刀。

最后，人们都知道吴承恩官长兴时曾与“邑绅徐中行最善，往还唱和”^⑤，什么时间徐中行恰在长兴能与吴承恩往还唱和呢？董作宾说是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徐中行丁父忧时；刘修业说是嘉靖三十二年徐中行“决江北辟，便道归省”^⑥。

嘉靖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徐中行确是在家乡长兴丁父忧，如果吴承恩正丞长兴，则与之往还唱和是可能的，惟苦于别的证据不足，不能定吴承恩恰是此时丞长兴。至于嘉靖三十二年，则徐中行回过长兴的可能性不大。王世贞《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⑦说：

而会郎杨继盛者上书效（按：可能是“劾”字之误）相严，论死，犹在系，公时时橐馐食之，间一入相慰语，慷慨歔噓，泣数行下。杨君谓：“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严当舍我而与若仇也。”公不顾。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拟入内阁司两制，不果；给事御史缺，拟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复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书乞南曹便养，报闻，会决江北辟，便道归省。寻迁员外郎，事竣还朝，转贵州司郎中。时杨君已得死，丧归，公解橐而追赠之。

按《明史》卷一百十二“七卿年表”二，李默复任吏部尚书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第一次为嘉靖三十年三月至十月）；《明史》二百零九《杨继盛传》，杨继盛弃西市在嘉靖三十四年十月。那么徐中之行决江北辟，便道归省，绝对不会在三十二年冬或三十三年春。因为李默两次推选徐中行任新职，徐中行又上书乞南曹，这一系列事件不会在两三个月内完成，当然就不会在三十二年秋去办秋审，而徐中行办完秋审回家一次然后回北京，也不能是从三十二年秋天到三十四年十月，去了两年多。

可见，徐中行之决江北辟便道归省是在嘉靖三十三年秋。吴承恩在嘉靖三十三年有许多证据说明他是在南京与家乡淮安的，于是吴承恩与徐中行往还唱和是嘉靖三十二年说不能成立，即该时吴承恩不能任长兴县丞。

如说吴承恩在嘉靖末隆庆初任长兴县丞，则徐中行恰在家乡能与之互相唱和的证据就太明显了。王世贞《送归熙甫之长兴令》^⑧（七律）是嘉靖四十四年秋或冬作的，其二的末联为“客星能动郎官宿，白雪阳阿兴有馀。”自注云：“子与时在邑，与熙甫善，故云。”徐中行这时为什么恰在长兴老家呢？前引王世贞的《徐中行墓碑》说：

〔徐中行在汝宁府任时〕当京朝大察，……察及公，当左迁。……公归，旦夕奉母许安人，怡怡如也。……公性好客，客时时满坐，所恨惟叠耻，饌食，取咄嗟办，而不问所自来。其童千亦喜客之至而娱之，冀以得自纾。即能缀韵语或操一艺者，问公衣则衣，问公食则食，问公所嗜若则为草荐书，或数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从容谓公曰：……公感，乃之吏部，选甫六日，得长芦之转运判官，为判官之三月，迁瑞州府同知。许安人以老寿死，……公奔归，恸欲绝。……时少师徐公与太宰胡内重公，超为山东按察金事，且欲进移公学职，会以丧闻乃止。服除，补湖广……。

由上引知徐中行于汝宁府知府被左迁后回到家乡一段时间，其间曾因去选官而离开过，但时间很短，然后是丁母忧三年，仍在家乡。据康熙《汝宁府志》说：“壬戌（按：嘉靖四十一年）起补汝宁。……官仅一载，竟中忌者之口，以京察左迁去。”可知被左迁回家乡是在嘉靖四十二年。又据王世贞《徐母许太夫人传》^⑨说：“汝宁君归里可二载，念太夫人老不欲出。（中略，大体同徐中行墓碑）〔徐中行之吏部〕，六日为补长芦运判，两月（按：前引墓碑为三月）迁貳瑞州，而太夫人已前卒于家矣。

太夫人卒之逾月，汝宁君扶服归。……”可知徐中行被母亲督促到北京去候选是嘉靖四十四年底或四十五年初^②。在京及几次转官到扶丧归，不过三四个月，大约嘉靖四十五年夏就回乡丁母忧了^③。——那么吴承恩在嘉靖末隆庆初任长兴县丞与徐中行唱和不是最有可能性吗？这时徐中行确实是以邑绅身分在家乡居住，而不像“会决江北辟，便道归省”时那么匆匆，两个人还未深知，互相唱和就不够味道。同时，便道归省的徐中行恰是官身，也不好称做“邑绅”！

既然可以肯定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是在嘉靖末隆庆初，就不能不涉及吴承恩和归有光的关系。因为归有光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除授长兴县知县，四十五年丙寅(1566)到任，隆庆二年戊辰(1568)去职任顺德府通判，和吴承恩任县丞是相终始的。由隆庆元年冬吴承恩书归有光作的《梦鼎堂记》和《圣井铭》也可以证明。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的集子里都丝毫没有对方的影象，《归震川集》所搜集归有光的诗文是比较全的。而和二人都有友好关系的徐中行、陈文烛在他们的集子里也都没提吴承恩和归有光的关系。

那么就考察一下吴承恩和归有光是怎样离开长兴的吧。吴承恩之离长兴，天启《淮安府志》说：“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④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说：“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有光之离长兴，《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说是“大吏多恶之”，所以“调顺德通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与王锡爵《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⑤ 都略同《明史》。陈文烛《归震川先生墓表》^⑥ 则说：“又议革粮长，用里甲，先生调停，大豪规避，与摄令者媒孽其短，先生几危，转顺德府通判。”——可见他们之

离长兴都是很很不愉快的。再来看看他们自己的意见吧。吴承恩没有提到这件事，归有光是一提再提，如《乞休申文》^⑤说：

职平日与物无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如诬污如李归安，而如前所陈，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递，苟少有为利，何不与大户市恩，而力护持小户，不顾其怨忿，而专取小户偏护之耶？署印与丞之以赃败也，由其发狂自宣露，囚服露首于太守之前。昨有岁贡自京还者，言京师皆已知之。今被访逮，即其发狂，乃职尚在河北时也。今府中藉藉归咎于职，若然，则察院不当访人耶？又因缘其所访之自而欲扳以为仇耶？今二怨与里递大户及近所治恶吏，结构为一。被访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于职，里递大户不肯服役，恶吏被申不归狱而反肆行于外。群不逞，藉藉欲谋咋啗，则一身无余矣。

归有光《又乞休文》^⑥则补充说：

署印官与县丞被察院蒙访逮，职前入覲在途。彼事已败，特以察院访单委悉，疑以谓县中有言，恨之切骨……。

好了，原来归有光离长兴，除与长兴大豪与县中恶吏（名沈良能）有关外，还和一个署印官，一个县丞中间有缠不清的关系哩！而且这个署印官和县丞都被察院访逮。这个县丞是谁？《长兴县志》偏偏漏掉了。如果如前所证明，这个被访逮的县丞可能就是吴承恩了。怪不得别人记载吴承恩离长兴只是含糊的说“耻折腰，拂袖归”，“不谐于长官”！怪不得和吴承恩有友好关系的陈文烛在吴承恩还在世的万历七年（1579）给归有光作墓表，对归有光在长兴时的宦况大都据归有光自己的《乞休申文》（墓表所据的行状大约就是如此写的），惟独讲到归有光离长兴，只提到“与摄令者媒孽其短”（摄令即归有光在两篇乞休申文中提到的署印官），而把归有光也是两次与署印官联提的县丞字样漏掉！

这段公案现在还难于弄清是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是吴承恩“不谙于长官”的长官包括归有光；一是吴承恩所以“拂袖归”者因被访逮，但未构成判刑大案，所以回乡后又补了荆府纪善之职。

四、《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

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几种明代版本《西游记》都题以华阳洞天主人校。一般讲，校者应该和作者熟识，甚至是作者的积极合作者。这华阳洞天主人是谁？姑且做个极大胆的推测：我以为他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⑦。

华阳洞天主人大约是江苏省句容县人，这是人们早已指出过的。而李春芳五世祖是从句容徙家兴化^⑧，他的老家应是句容。所以吴承恩在前边提到过的《元寿颂》中说：“建业龙蟠，坤灵会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寿李春芳父八十寿辰的《德寿齐荣颂》说：“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这里直接提出了句容名迹华阳洞天的字样。《赠李石麓太史》（七律）有句云：“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繙太乙编。”又提到华阳洞。这是很奇怪的，给老年人做寿，提一提他和神仙有渊源关系的华阳洞天老家，是说得通的；人家考中了状元，除授了翰林院修撰，当朋友的赠诗还特意提什么老家华阳洞之类，不是有点太突然么？似乎吴承恩对李春芳与华阳洞天有联系这件事印象太深了。吴承恩还有一首七律《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原诗如下：

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鷗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六月车尘惊客鬓，连宵乡梦绕山堂；明珠有赠惭无报，

系在罗襦不敢忘。

可注意的是第二联,用东方朔和司马迁的故事说明自己的心境,表面上看是直接用典^②,但典之中是否有另外的涵意呢?胡应麟《玉壶遐览》^③记载前代诸书中所称引的加仙号者多人,其中东方朔号华阳洞主。而人们一般都想像吴承恩候选在京大约是依托李春芳的,因此“纵令索米容方朔”除去表面用东方朔典的意味外,就可能包含着:“纵然我依托东方朔索米(吃饭)能被相容而不被驱逐”的另一层意味。以东方朔比李春芳,是不是李春芳和东方朔同一个诨号都叫华阳洞天主(人)呢?若是,“未必含毫像子长”则是说自己作的《西游记》(按我的意见,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吴承恩已最后完成了《西游记》的写作)虽被李春芳赏识,给以校订,但自己没有司马迁的大才,《西游记》也不敢比类司马迁的《史记》。——假如对这首诗可以像我那样解释(按照通常解释法我那样解释是牵强附会的),那么反转过来也能证明《西游记》确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以前就完成了的。

注:

- ① 转引自《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版71页。
- ② 民国三十八年中华书局版下卷385页。
- ③ 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版136页。
- ④ 因为原诗没有标写作年月,而诗作于何时涉及《西游记》的写作时间问题,所以略为考证。按:《山带阁集》第八卷共二十五篇诗,其中第二十二篇题《驾幸承天作》,是嘉靖十八年作(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幸承天),其后三篇也是同年所作。第十卷则是嘉靖二十二年的诗作。因朱曰藩在该年生病欲死(见《山带阁集》卷二十八《朱氏世录序》),而此卷诗正是写大病中自己的